

CHAPTER 2

为什么
能收拾好
国民党
留下的
烂摊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这种想法，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它面对的考验依然十分严峻，考验的重点已不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之相比解决起来更为复杂、艰难的经济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全国性的以及大城市中的经济问题以往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国内外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出怀疑：国内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来自国外的质疑更为普遍，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当共产党的军队于1949年进军战胜国民党时，他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不过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¹⁰然而，中国共产党仅用短短的时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为“韩战”）——就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交出的这份“经济答卷”令世人惊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多年战乱破坏的 国民经济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业的状况，根本谈不上体系，工业产品少得可怜；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数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邮电、通信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电话、电报多用手工方式操作，约有一半左右的县没有自动电话，约有四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和长途电话，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总崩溃，使得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更大大倒退。从工业生产的状况来看，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50%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25%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50%。再看农业生产，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经陷入破产境地，水旱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下降21%，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由于长期的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此外，战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在国内战争后期被大量转移。1948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

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12月1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把第一批黄金200万两运往台湾，随后又南运银元1000万元至广州。1949年1月，再运黄金57万两、银元2200万元至厦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前夕，又卷走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19.8万两、银元146万元。上海解放后，国民党中央银行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时，只剩黄金6180两、银元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领域的29家垄断企业撤到香港，这些企业的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大量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也被国民党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资金、物资和人才的大量转移，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的难度。

由此，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种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萧条，在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甚至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之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1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

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艰难起步的。

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

中国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和7月，就有过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接连不断的物价上涨风潮，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若不能成功遏制物价飞涨局面，不仅恢复国民经济无从谈起，就是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也会成为疑问。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是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趋势。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趁物资极其匮乏之机，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了1.8倍。有些人发出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粮食、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的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



在1952年反对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简称“五毒”）的“五反运动”中，上海仁丰机米厂的工人当面揭发老板（左）的投机违法行为。

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这是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取得的成功。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但是，打击投机资本虽然使市场物价

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趋于回落，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军政费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物价的波动仍不可避免。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然而，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原解放区财政工作的分散状态尚未改变，地方政府征收的公粮和各种税收等，主要用于地方的支出，没有上缴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担负着还在进行着的战争费用（新中国成立时，尚未实现全国解放，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行政开支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和足够的收入。如果财政收入不集中统一于中央，继续各地为政，中央靠发钞票来维持，那么稳定物价就会落空，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没有稳定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统一财经，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重拳出击，到1950年4月，全国的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经济稳定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经济稳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认为其“不下于淮海战役”。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不要四面出击”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这一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先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和部署，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国共战争还在进行的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一个多月后，针对各方有关如何恢复和发展的问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当时

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对矛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前途。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丧失经济基础，劳资矛盾处理不好有可能使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内外关系处理不好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贸易发展迟缓。而在统筹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力。

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临重重阻力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及建国后社会经济面临的改组，各阶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上步履维艰，加之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时，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样苦？”大部分农民，由于没有实行土改，又要缴纳公粮，也有意见。而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如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这些有悖“四面八方”政策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改善工作。有鉴于此，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坚持“四面八方”。他还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为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1956年，全国私营企业都实行公私合营，实际上很快就被改造成国营企业。图为上海信大祥绸布店挂出公私合营的喜报和招牌。

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比如，实现了对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一视同仁，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再如，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包括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在内的600余万公职人员，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包下来”政策。这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提出，宁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也不能不管旧人员。这项富有远见的措施，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凝聚。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击”政策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即使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也牢牢地抓住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经济建设经费在全部国家财政预算中，1950年占25.5%，1951年占29.5%，1952年占45.5%。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每年都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在打这样一场大仗，又在国内开始建设工作，而财政赤字比原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经济建设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如此高的比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事。

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经济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就在他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吃饭问题就要靠农业，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恢复农业就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从1950年秋收后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地陆续展开，至1952年冬、1953年春，有3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欢天喜地地讲：“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中到处呈现一派兴旺的气象。因战乱而荒芜的大片耕地重新得到开垦，以华东地区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总播种面积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青海省民和县磨沟村回族雇农冶金财在土改中分得土地二亩五分，这是他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与之相应，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市场繁荣，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也开展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旧中国的工矿企业，普遍地存在着封建把头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不打乱原有的生产机构、便于接收，中国共产党对工矿企业中的封建势力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随着国营经济的逐步建立，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企业中进行了系统的、有组织的、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讨论通过了废除各地搬运行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以此为先导，在煤矿、纺织业等工矿企业中也相继废除了这类制度。与此同时，又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管理，还把一批有经验的工人提拔到行政和生产负责岗位上来。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又进行了生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建立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等。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大大提高和加强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

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兴修水利和改善交通是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另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但是水患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为此，1950年中国共产党重点治理了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随后，把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新中国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与国民党政府水利经费最高年份相比，1950年相当于他们的18倍，1951年相当于他们的42倍，1952年相当于他们的52倍。在三年内，全国有2000万人参加了水利建设，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荆江分洪和官厅水库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



1950年全国各地秋粮丰收，总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6%。

荆江分洪和官厅水库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20世纪50年代治理淮河的现场。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上的第一列火车由重庆开出，在2日上午11时5分到达成都车站，受到各界人民5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是在这时开工建设的。相当于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的水利工程修建了起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点加强了以铁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经过惊人速度的抢修和建设，至1952年，全国共修复了受战争损毁严重的津浦、京汉、同蒲、陇海等铁路近1万公里，新建了成渝、天兰、宝成等铁路1473公里。三年间，修复的公路有3万多公里，新建公路2000多公里。内河货运量，1952年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解决的“行路难”问题，为工农业发展和城乡交流奠定了基础。

“新旧社会 两重天”

恢复国民经济是同建设一个新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社会，许多贫苦民众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虽受尽种种磨难，但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讲。这种状况不改变，恢复国民经济也就无从谈起。为改变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为恢复经济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但是在男权至上的旧社会，她们所受的灾难异常深重，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一时的《妇女自由歌》所唱：“旧社会好比那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哟，妇女在最底层。”以强迫包办、男尊女卑和漠视子女权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是旧中国妇女饱受磨难的重要原因。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但是封建制的婚姻制度还没有彻底根除。这一纲领的贯彻虽起到了一定的规约作用，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早婚、虐待妇女等一些封建积习，仍广泛存在。为了从制度源头上彻底改变这种情况，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颠覆性的作用。它以法律的形式，将婚姻稳固在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上。婚姻法颁行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婚姻法宣传队深入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乡村，进入每一个家



北京市第十四区农民袁荣和杨淑英情投志合，于1951年10月8日在新婚姻法的保障下举行了正式结婚典礼。

庭，讲解婚姻法的要旨，并告诉广大妇女：她们自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制度，仍然在危害着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从而成为当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通过后，在12小时内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国各地也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对妓女进行收容和教养，帮助她们治疗疾病，学会一种生产技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重新走上社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了娼妓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大批不幸的妓女获得新生。

鸦片烟毒，也是旧中国遗留的相当普遍的社会丑恶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约有2000万人吸毒，占当时总人口的4.4%，即每25人中就有1名吸毒者。为了彻底根绝烟毒之害，割除这一旧中国的痼疾毒瘤，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一场全民动员的禁烟、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公布《关

2. 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封闭一切妓院，将昔日被蹂躏的妓女集中到妇女生产教养院，为她们治病并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图为教养院的学员在扭秧歌。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于禁止鸦片烟毒的通令》，严格规定：“在军事上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各地方按照通令的要求，相继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这些地区性法规的实行，保证了禁烟、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大力整肃之下，贻害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的清除工作，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震惊世界的奇迹。

建政伊始，中国共产党迅疾地扫除了压迫妇女、娼妓盛行、烟毒泛滥等社会丑恶现象，这些都是民众深恶痛绝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未能解决的问题，由此民众切身感受到这种社会进步，由衷地发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叹。

经过大力建设,至1952年年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53.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在工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不但达到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不仅保证了战争的需要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开始了对重点建设的投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1952年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加60%~120%,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已达到或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整个国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百年来备受欺凌的中国人民不仅切身感到了生活的安定,而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这一切的实现,是在没有现成答案的情况下取得的,全体中国人民正是从这些亲眼目睹的事实中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能领导人民打碎一个旧世界,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1953年年底,中国第一座无缝钢管厂——鞍钢无缝钢管厂投入生产。图为工人们在生产出第一根无缝钢管时,满怀喜悦,争相观看。

